

# 中央苏区时期党组织 在国营工厂中的功能建构

王久高 樊宸余

**【摘要】**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营工厂中设置了党的基层组织,展开了早期工厂管理中“国企党建”的探索。国营工厂党组织通过军事管理与属地管理并存的方式嵌入了党的组织体系,并通过组成“三人团”及领导群团组织工作的形式嵌入了国营工厂的组织架构。在此基础上,国营工厂党组织以加强自身建设为前提,开展了政治领导、组织动员、思想教育和服务群众等工作,从而确保了党组织功能在实践中得以具体实现。国营工厂党组织功能建构的根本依据是党组织对自身的科学定位,直接动力是时代的需要,其目的是实现政党权力在工厂中的有效嵌入。

**【关键词】**中央苏区时期;党组织;国营工厂;功能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党的自我革命与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研究”(项目编号:23AIDJ003)的阶段性成果。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从兴办军事工业入手,初步建构起军需为主、兼顾民用的国营工业体系。这些国营工厂是“关于制造军用品和群众特别必需品的产业”<sup>①</sup>,因此不可避免地体现了苏维埃政权对工厂的强控制。“苏维埃政权之正确的组织,是要以党的坚固的指导为条件的。”<sup>②</sup>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逐步在国营工厂中设置了相应的党组织。然而由于苏维埃的国营工厂“只限于可能的和必要的一部分”<sup>③</sup>,工厂的数量与规模较为有限;加之中央苏区时期党组织在工厂内的工作目标更集中于进行政治、军事与生产动员,与当前系统化的国企党建工作相比存在明显的不同。长期以来学术界更侧重于对国营工厂建设史的总结,尽管已有一些成果论及党对工厂的领导,但对该时期国营工厂党组织的工作机制和内容等仍缺乏系统梳理。事实上,中央苏区时期党在领导和管理国营工厂的过程中,在尝试建构工厂党组织功能的基础上,展开了早期工厂管理中“国企党建”的探索,并使之成为后来党领导国营工厂的重要经验来源。有鉴于此,本文拟围绕中央苏区时期国营工厂党组织功能建构的依据、嵌入机

制与具体实现进行探讨,以期呈现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环境下建立与巩固国营工厂党组织的思想理路。

## 一、中央苏区时期国营工厂党组织功能建构的时代依据

正如恩格斯所言,每一历史阶段“对它发生的那个时代和那些条件说来,都有它存在的理由”<sup>④</sup>。作为新鲜事物出现在革命根据地的国营工厂正是这一时期工农武装割据的特殊产物,它最初是在革命物资需求的推动下产生的,并随着革命根据地的扩大与巩固而不断发展。可以说,中央苏区时期的国营工厂承载着特殊的时代使命,这也成为这一时期国营工厂党组织功能设置的内在依据。

### (一)中央苏区时期国营工厂的时代使命

中央苏区时期,敌人的经济封锁与长期的革命战争环境,“不能不影响到苏维埃经济的特点与它的发展”<sup>⑤</sup>。这一时期苏区发展经济的原则,一是集中一切力量保证战争的需要,二是适当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sup>⑥</sup>在此特殊时代背景下,国营工厂实质上是为保障革命战争和民众生活的物资供给而设立的。

国营工厂首先是作为军事保障的“后勤”战线出

现的。毛泽东同志强调,充实红军的给养是“对于革命战争有决定意义的事业”<sup>①</sup>。然而,中央苏区是地瘠民贫之区,工商业非常不发达。如果仅依靠原有以手工业为主的工业,无法满足大规模物资供应和武器机械制造的要求。在此背景下,“集中苏区的一切经济力量,帮助革命战争”<sup>②</sup>成为重要任务。事实上,“苏维埃特别注意保障供给红军的一切企业的发展”<sup>③</sup>,不仅设立了中央军委兵工厂、福建军区兵工厂等修造武器的工厂,而且开办了中央被服厂、中革军委印刷厂等后勤保障工厂,真正将经济建成了战争动员中的重要一部分。

国营工厂也承担着保障民众生活需要的重要任务。这一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十分严密,“水陆断绝,运输艰难……因此造成农产品过剩、工业品恐慌,油盐布匹及一切的物价飞涨”<sup>④</sup>。为保障根据地民众的生活需要,该时期中国共产党也设立了中华织布厂、中华樟脑厂、中央造币厂、熔银厂等有助于满足军民生活的国营工厂。尽管这些工厂在国营工业体系中不占主导地位,但对于支援战争、打破经济封锁和改善军民生活的作用是很大的。

国营工厂的发展也是可能的“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sup>⑤</sup>。由于经济的落后和社会的不稳定,还必须利用私人资本来发展苏区的经济。尽管如此,“合作社经济和国营经济配合起来,经过长期的发展,将成为经济方面的巨大力量,将对私人经济逐渐占优势并取得领导的地位”<sup>⑥</sup>。事实上,国营工厂中公有制的所有权形态、工人的民主管理、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等,正是社会主义成分的体现。国营经济的发展也有助于造成阶级力量上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变动和经济上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倾向。国营工厂实际上成为工农群众建构对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认知与政党认同的重要场域。

## (二)中央苏区时期国营工厂党组织的功能定位

中央苏区时期,为更好地将工人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国营工厂建立了党团和工会组织。在特殊时代背景下,国营工厂党组织积极“求得适合斗争条件与需要”<sup>⑦</sup>,立足时代使命明确了自身的功能定位。

其一,国营工厂党组织是真正运用党的政策去

领导群众的领导者与组织者。“只有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巩固与加强,才能够保证工农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sup>⑧</sup>。国营工厂作为苏维埃政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保障革命物质基础、推动根据地经济发展等重要任务。因此,党组织必须在发展生产中承担起领导者与组织者的重要责任,真正将自身建成工人群众中的核心。

其二,国营工厂党组织应提高工人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中央苏区时期,“提高我们的技术,增加我们的生产,是苏区工厂的主要任务,尤其是在国家企业的工厂里”<sup>⑨</sup>。因此,国营工厂党组织应充分发挥组织优势与政治优势,充分动员与凝聚工人群众以确保完成各项生产任务。事实上,国营工厂党组织的生产动员功能正是基于这一时期的特殊时代需要而建构的,是与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其三,国营工厂党组织应充当“党的宣传学校”<sup>⑩</sup>。正如马克思所言:“只有当工人通过组织而联合起来并获得知识的指导时,人数才能起举足轻重的作用。”<sup>⑪</sup>为培育工人的劳动热忱与革命意志,国营工厂党组织“应经常广大的向工人解释和教育‘以新的态度对待新的劳动’”<sup>⑫</sup>。同时,使工人了解国营工厂是“为着供给战争,为着供给工农大众的需要,为着创造人类最大的幸福而生产”<sup>⑬</sup>的工农民众的工厂企业,从而激励工人群众自觉地把劳动积极性提高到最高程度。

其四,国营工厂党组织应经常了解群众的实际生活。党的支部是党在群众中的核心,因此工厂支部应注意“倾听群众的意见,从各方面去改善群众的生活”<sup>⑭</sup>,从而更好地使工人群众团结在工厂支部的周围去工作。这既是中国共产党性质与宗旨的内在要求,也是使广大工人群众“从这些事情出发,了解我们提出来的更高的任务”<sup>⑮</sup>,从而自觉接受与响应党的政治号召的重要做法。

## 二、中央苏区时期国营工厂党组织功能的嵌入机制

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国营工厂并设立工厂支部始于土地革命初期。然而,由于早期的工厂尚未来得及深入探索工厂管理办法,因此,如何将国营工厂党组织有序地嵌入党的组织体系和工厂的组织架

构,理顺隶属关系、党企关系与党群关系,成为中央苏区时期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 (一)隶属关系:军事管理与属地管理并存

由于“党的一切决议,必须经过支部执行”<sup>②</sup>,因此公营工厂党组织实际上肩负着在工人群众中“把党的决议与任务成为群众的实际行动”<sup>③</sup>的艰巨任务。为确保基层党组织的工作真正体现党的意志,必然要求通过党的组织体系实现对公营工厂党组织的坚强领导与监督。

中央苏区时期,在工农武装割据的特殊时代背景下,公营工厂党组织的隶属关系呈现出军事管理与属地管理并存的特点。早在“一苏大”以前,一些军需工厂就由军事机关建立与管理,如1931年10月建立的官田兵工厂直属于中革军委领导。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各部门和各级苏维埃政府也建立起一些公营工厂。1934年,《苏维埃国家工厂支部工作条例》中明确规定,“除军事工业中有政委的工厂支部,与地方党只发生横的关系(如协助地方工作,请地方党部作地方工作报告等)外,其余的工厂应一律直接受地方党的区委或县委的领导,经常向所在地的党委员会作报告,请求讨论本厂支部的工作”<sup>④</sup>。在公营工厂发展过程中,上级党的领导为工厂的发展指明方向,同时,公营工厂的许多生产任务正是经由“上级党委分配下来的任务”<sup>⑤</sup>。

在隶属关系建立的基础上,各级党组织充分发挥组织资源优势,为公营工厂的发展提供帮助。这一时期,在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下,缺乏相应工业基础的中央苏区公营工厂的技术工人普遍不足。为解决这一限制工厂发展的关键难题,弹药厂的厂党委“派了工人到闽西造弹厂学习技术”<sup>⑥</sup>;岗面红军兵工厂,“对于缺少的各类技术工人,如车床、翻砂等,又通过上海和沈阳地下党组织选派此类工人党员参加,或以高工薪聘请,通过秘密交通线,不远千里护送到中央苏区”<sup>⑦</sup>。在公营工厂的发展遭遇难题时,各级党组织也积极予以协调解决,如在中央苏区红军兵工厂遭遇纠纷、AB团问题和地雷爆炸事件时,“都经过上级的关怀和帮助,比较及时地解决了”<sup>⑧</sup>。

总体而言,在军事管理与属地管理并存的隶

属关系下,所属上级党组织积极“面向企业,一切工作经过支部,依靠支部,用一切具体办法帮助支部”<sup>⑨</sup>,真正将公营工厂党组织建成了党在公营工厂中的组织基础与战斗堡垒。这一隶属关系的确立,也为公营工厂党组织功能的具体实现创造了前提条件。

### (二)党企关系:确立“三人团”管理模式

中央苏区时期,公营工厂的发展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点:井冈山斗争初期,为满足军需的迫切需要,就已创办了步云山军械所等小型工厂;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缴获资金、机器和材料的基础上,建立起一批公营工厂;之后,随着中央苏区正式形成,公营工厂广泛地发展起来。可以说,复杂多变的历史环境影响着苏区公营工厂的发展,也构成了这一时期公营工厂党企关系调适的现实基础。

“一苏大”以前,由于许多公营工厂设立的直接目的是修造武器、缝制服装以保证战争的需要,因此在管理上具有军事化的特点。一些工厂“厂长的任命、生产计划、原料供应、产品分配都由部队负责”<sup>⑩</sup>,甚至出现了政委决定一切的现象。

然而,管理工厂不同于管理军队。1933年,国民经济部和总供给部分别设立了国有企业管理局和军事工业局。然而,由于面临着严峻的内外形势,公营工厂在管理方面尚未来得及制定相应的制度,混乱状况仍是严重存在的。在厂内权力分配方面体现为“厂长的权限没有正式规定”,有的厂长甚至宣布“工会要我怎样办我就怎样办”<sup>⑪</sup>;而在工厂的生产工作中,有的厂长出现了职责缺位的现象,面对厂内的不良现象“不了解实际情形,提不出具体的办法”<sup>⑫</sup>。

为改变工厂管理中的混乱状况,1934年3月刘少奇在《论国家工厂的管理》一文中提出了建立完全的厂长负责制的主张<sup>⑬</sup>。随后出台的《苏维埃国有工厂管理条例》与《苏维埃国家工厂支部工作条例》明确规定,国有工厂实行厂长负责制,厂长“对于厂内一切事务,有最后决定之权”<sup>⑭</sup>;在厂长之下,设由厂长、其他负责人、工会代表、党团代表等组成的工厂管理委员会,解决厂内的重大问题;在管理委员会内,厂长、工会委员长、党支部书记组成“三人团”,以

便迅速协同处理厂内的日常事务。这一模式概括而言,就是使厂长的权责与职务相匹配,“三人团”与管理委员会协助管理并实现民主监督。如第三被服厂就是“由厂长、支部书记、工会主席三人集体领导”,厂长“抓生产的全面管理”,支部书记“做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工会主席“负责具体任务的组织落实,检查监督,解决和反映工人中存在的问题”。<sup>⑤</sup>这一管理模式较好地处理了工厂内部的党企关系,使权责归属更加清晰。

### (三)党群关系:党组织领导群团组织工作

中央苏区时期,公营工厂设立了工会、青年团等群团组织。这些群团组织肩负着凝聚工人群众的重要使命,是巩固党的群众基础的重要载体。在中央苏区时期的公营工厂中,党组织通过嵌入群团组织工作,实现了对群团组织的坚强领导。

首先,实现组织架构上的嵌入。这一时期,为确保党对公营工厂中群团组织的领导,在党与群团组织关系方面,1930年的《职工运动决议案》就已强调“用党的最好干部,来担负工会的职任”<sup>⑥</sup>,《苏维埃国家工厂支部工作条例》则明确规定,“工会委员长与团支书必须是党员,都应参加党的干事会(即工会干事与团工作干事),干事会须经常检查其工作”<sup>⑦</sup>。同时,群团组织工作被列为党组织的重要工作内容。如在工会工作方面,“工会名单与工作计划,必须在支部干事会中讨论”<sup>⑧</sup>等。这一组织结构与工作机制,有力地确保了党组织对群团组织的领导。

其次,领导群团组织开展具体工作。“国家工厂各方面情况的改善,必须得到工会与大多数工人自愿的乐意的热情的参加与合作,才能够顺利地完。”<sup>⑨</sup>因此,为更好地领导苏区工人群众开展生产活动,这一时期公营工厂党组织依托群团组织开展了多项工作。在响应党的方针政策方面,中央造币厂“在党的领导之下经过工会动员,推销经济建设股公债原

定一百五十元,现在已推销了二百五十元”<sup>⑩</sup>。在工厂生产方面,“经常由党和工会的干部组织突击队”,并“建立了生产的模范队”<sup>⑪</sup>。在服务工人群众方面,要求“党与工会要拿住了工人群众这些最迫切的问题去改善工人的生活”<sup>⑫</sup>等。可以说,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公营工厂内的群团组织充分发挥了组织落实具体任务的重要作用。

总体而言,中央苏区时期公营工厂党组织通过领导群团组织开展工作,使党的领导有效地延伸到工人群众中,实际上将公营工厂建设成了教育与团结工人群众的重要载体。同时,也为党组织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和开展各项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

## 三、中央苏区时期公营工厂党组织功能的具体实现

在嵌入党的组织体系和工厂组织架构的基础上,公营工厂党组织在工厂中如何具体地开展工作的,这是考察苏区公营工厂必须解答的问题。这一时期,公营工厂党组织在加强自身建设的基础上,结合工厂实际采取了领导、教育、动员和服务等举措,从而确保了党组织功能在实践中得以具体实现。

### (一)支部建设:建强组织动员的战斗堡垒

党支部是党的基层组织,“支部工作不健全,任你有很好的策略也都无法实现”<sup>⑬</sup>。事实上,中国共产党早就强调了在连队中建立支部的重要性,“因每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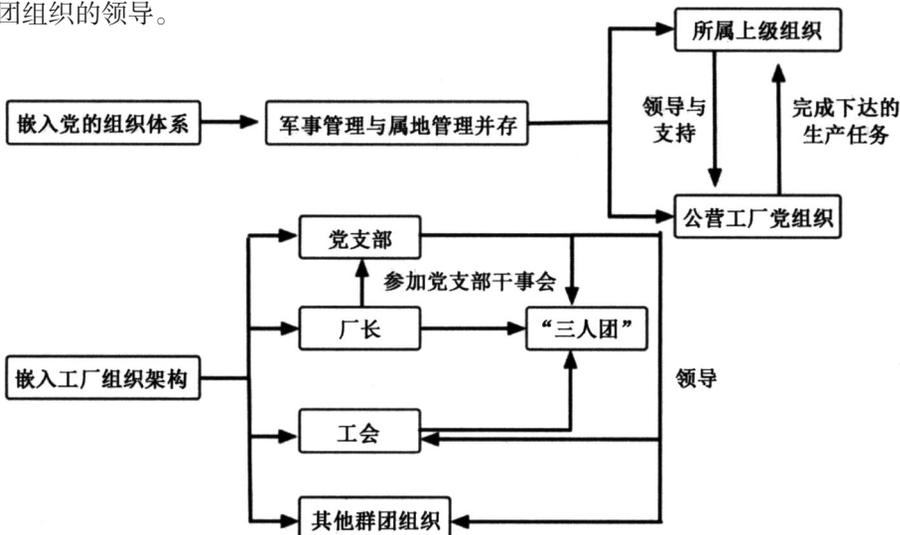


图1 中央苏区时期公营工厂党组织功能的嵌入机制

连可以担任一方面的任务,一个支部恰可以应付这个任务”<sup>④</sup>。在公营工厂中,党的任务的实现同样依赖于基层党组织的坚强与牢固,这一时期公营工厂党组织开展了支部建设的丰富探索。

一是出台相关条例,规范支部生活。党的支部是“党的生活中心”<sup>⑤</sup>,规范的支部生活是影响党员战斗力的重要因素。为此,中国共产党针对工厂支部颁布了《关于健全地方支部生活的问题给苏区各级党部的指示信》《苏维埃国家工厂支部工作条例》等文件,对公营工厂支部的任务、组织与分工等作出规定。在此基础上,公营工厂在规范支部生活方面作出许多尝试,如会议制度方面,中央造币厂“每月开四次干事会,四次小组会,二次支部大会”<sup>⑥</sup>;党费方面,中央兵工厂规定党费每月六铜板等<sup>⑦</sup>。这些规范的制定,使公营工厂支部建成了动员生产的坚强堡垒。

二是严肃党内纪律,惩治不良分子。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明确要求“严紧党的纪律,对于一切违抗党的决议与纪律的分子,应加以必要的处分”<sup>⑧</sup>。在公营工厂中,党组织紧密结合生产需要严肃党内纪律管理。如枪炮厂中,“周亚香,因做瞄准机不能完全使用,党内给他警告”<sup>⑨</sup>;中央兵工厂对犯错误的同志,“第一、二次是批评教育,到第三次就开大会讨论如何处理”<sup>⑩</sup>;中央印刷厂“前厂长杨其鑫同志及现厂长古远来同志对于生产采取不可容许的官僚主义的态度”<sup>⑪</sup>,被给予了严重警告。公营工厂党组织通过“打击最坏的分子”<sup>⑫</sup>,在工厂中营造出了浓厚的争先氛围。

三是训练新老党员,培养干部人才。中央苏区时期,公营工厂内党员人数较多,如银坑造弹厂“党员有百分之二十到三十”<sup>⑬</sup>。为加强对新老党员的训练,这一时期公营工厂党组织对党员的教育工作非常重视,如中央造币厂坚持“在党内每星期训练一次新党员,老党员也有参加”<sup>⑭</sup>。为提升支部同志的工作水平,还组织参加了相关的训练班,如刘凯夫在担任党支部书记期间,“还到留守处支书训练班学习过一个月”<sup>⑮</sup>。

总的来说,推进党的支部建设是不断增强其组织和领导群众的力量内在要求。也正是通过卓有

成效的支部建设,使得该时期公营工厂内“党、团员在生产中处处起先锋模范作用”<sup>⑯</sup>。

## (二)政治领导:确保工厂的社会主义方向

“健全支部工作,加强支部领导力量,是党的组织上最迫切重要的问题。”<sup>⑰</sup>中央苏区时期,尽管公营工厂实行“厂长负责制”,但这并不意味着党组织在公营工厂中的地位被忽视、被弱化。事实上,公营工厂党组织通过把握工厂政治方向与发展方向,实现了对公营工厂的有效领导。

一是领导公营工厂政治方向。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因此在工厂中必须使工人群众深刻理解“现在再不是为地主资本家而劳动了,而是为工人阶级自己、为人类的最后解放而劳动着”<sup>⑱</sup>。在革命战争背景下,这一任务则进一步具体为使工人们积极响应党的方针政策,集中力量为争取革命的胜利而斗争。这一时期,在公营工厂党组织的领导下,工人们积极通过实行义务劳动和以“节衣缩食的精神来慰劳红军”<sup>⑲</sup>等方式支持与拥护革命事业,这也足以证明“他们阶级觉悟的深刻,对目前政治形势正确的认识”<sup>⑳</sup>。

二是领导公营工厂发展方向。中央苏区时期,公营工厂党支部除派出支部书记与厂长、工会委员共同组成“三人团”处理厂内事务外,为确保党的政治领导在工厂管理过程中的实现,“厂长或副厂长为党员时,须有一人参加干事会,但不担任干事会内部工作,以免妨碍工厂管理的工作”<sup>㉑</sup>。这也是因为“党的支部,是生产的支部,应该由在业同志来参加和领导工作”<sup>㉒</sup>。同时,党组织在工会、青年团等群团组织中均设置了专门负责的干事,以确保对群团组织工作的领导。这一做法在当时公营工厂的管理中为确保工厂切实服务于苏区的中心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总体而言,使支部成为工厂中强有力的领导者是公营工厂党组织建设的重要任务。当然,为确保对工厂的坚强领导,公营工厂党组织在生产动员、思想教育等过程中也充分发挥了领导作用。

## (三)组织动员:围绕生产任务发动工人群众

中央苏区时期,公营工厂的生产条件十分艰苦:“一把锉刀,牙锉光了就翻锉一次”<sup>㉓</sup>;工人“可领到一

点零用钱,没有工资”<sup>④</sup>等。在此情况下,“没有正确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要迅速地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是不可能的”<sup>⑤</sup>。为此,党组织必须在有限的条件下最大限度调动工人的生产积极性。

一是组织工人学习,提高劳动技术。在中央苏区的公营工厂中,由于缺乏相应的工业基础,工厂的技术水平十分落后,技术装备也十分匮乏。官田兵工厂建立之初“只有锉刀两百多把、老虎钳一百多把、四座打铁炉”<sup>⑥</sup>。为解决生产技术问题,公营工厂党组织除从其他地区调任技术工人外,还通过在俱乐部里面提倡技术竞赛、设立技术研究组等形式组织工人进行学习。这些工作的成效是十分显著的,官田兵工厂“在厂党委的领导下,全厂掀起了钻研修枪技术的高潮”<sup>⑦</sup>。

二是开展政治动员,培育劳动热情。在中央苏区的公营工厂中,党组织通过政策宣传和思想动员等方式,向工人群众说明支援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是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以‘工人应该提高生产为争取苏维埃胜利而斗争’来教育工人”<sup>⑧</sup>。这充分调动了工人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工人们“只要支部一动员,一号召,大家就千方百计地完成”<sup>⑨</sup>。可以说,在生产革命物资的过程中,工人群众充分展现出了甘于奉献、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忘我劳动的精神。

三是制定生产纪律,加强纪律监督。中央苏区时期,公营工厂制定了严格的生产纪律。“在国有企业中,必须与破坏劳动纪律、违犯厂规、偷窃公共财物、浪费材料及怠工偷懒的现象进行坚持的不调和的斗争。”<sup>⑩</sup>事实上,在对公营工厂的调研过程中,刘少奇就已发现工厂的劳动制度很不健全,要求国家工厂必须制订完备的工厂规划、健全劳动制度。为此,很多公营工厂“制定了严格的工作纪律,对每个工人都实行了定额、定量定时完成任务的要求”<sup>⑪</sup>,一些工厂还“经党团政府工会共同组织了突击队到工厂去突击,洗刷并处罚了少数破坏生产的害虫”<sup>⑫</sup>。

四是开展革命竞赛,树立劳动模范。“提高劳动热忱,发展生产竞赛,奖励生产战线上的成绩显著者,是提高生产的重要方法。”<sup>⑬</sup>在公营工厂中,中国共产党常常组织劳动竞赛,以此激励工人们争做先

锋。如中央兵工厂在革命竞赛中,“在提高劳动纪律上、节省材料上,提高生产数量与质量上,超过了原定计划百分之八十”<sup>⑭</sup>。还有一些“企业工厂热烈的订立了革命竞赛的条约”<sup>⑮</sup>,在经济战线形成了一股你追我赶的良好氛围。可以说,革命竞赛无疑成为当时发展经济的重要举措。

公营工厂党组织开展生产动员的方式是多层次、多方位的,是以夯实生产技术为前提,以思想动员、利益动员为主要手段,以制度建设为强制力,以劳动模范引领为推动力的动员模式。这一模式具有鲜明时代特色,是与中央苏区时期生产水平较低、工人思想认识水平不高等因素相联系的。

#### (四)思想教育:提升工人群众的政治文化水平

思想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实现政治领导和思想领导的重要方式。“宣传鼓动工作,在党的整个工作中,占着极重要的位置。”<sup>⑯</sup>党的组织体系尤其是包括工厂党组织在内的基层组织的建立,更是建立起了严密的思想教育网络。这一时期,公营工厂党组织积极“用文化教育工作提高群众的政治和文化的水平”<sup>⑰</sup>,在思想层面有力地凝聚起了工人群众。

一是组织开展多样的思想教育活动。根据《苏维埃国家工厂支部工作条例》规定,苏维埃工厂的党支部应当“经过俱乐部,吸收全厂工人参加夜校,读报,识字,墙报,娱乐,体育等组织,提高政治文化水平”<sup>⑱</sup>。事实上,尽管当时生产任务十分繁重,但针对工人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始终保持的。如中央造币厂,“在群众方面每月两次政治课,全体工友参加。工人夜夜分为甲乙丙三班轮流上课,工友都能按时到”<sup>⑲</sup>。第一被服厂的工人们“有材料时挤命干,没材料时就学政治、学文化,每周还专门有一个下午学习政治或组织集体活动”<sup>⑳</sup>。

二是开展个别思想工作。为更好地引导落后分子树立先进观念,这一时期公营工厂党组织还针对个别工人进行说服教育。如苏区兵工厂“党团员都要进行个别谈话”<sup>㉑</sup>,中央枪炮厂“工人有不好的表现,厂方即通知工会,工会即找工人谈话,进行个别说服解释的工作”<sup>㉒</sup>。事实上,个别教育是中央苏区时期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方法,毛泽东同志就曾指示兵工厂在解决六个上海工人问题时,“除采

取一般的政治教育外,还要多做些个别工作——谈心,说服教育”<sup>⑧</sup>。这种工作方法有效解决了部分工人在思想上可能存在的落后现象,有力统一了工人的思想。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采取团结、教育的方针,不断启发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充分调动起了工人群众的革命热情。可以说,思想教育功能在国营工厂的设置,既是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体现,也是对工人阶级革命基本动力军作用的强调和确认。

#### (五)服务群众:真正实现对群众的领导

“我们是革命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我们又是群众生活的领导者、组织者。”<sup>⑨</sup>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和价值追求。在国营工厂中,党的基层组织正是深入群众中去开展工作的,发挥着服务群众与联系群众的重要功能。

一是密切联系群众,营造良好的党群关系。中央苏区时期,国营工厂党组织作为党设立在国营工厂的神经末梢,是党最直接接触广大工人群众的基层组织。因此,国营工厂党组织如何处理党群关系,直接影响着工人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与看法。这一时期,国营工厂党组织始终坚持深入群众、密切联系群众,“各级干部以身作则,与工人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同劳动”<sup>⑩</sup>。在党的关怀下,国营工厂的“职工们从此更积极地增加生产,支援红军与敌人作坚决的斗争”<sup>⑪</sup>。

二是深入群众,服务群众。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为着在经济战线上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sup>⑫</sup>,也必须在国营工厂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整合功能。为此,《苏维埃国家工厂支部工作条例》明确规定了苏维埃工厂支部服务群众的职能,即“须了解工

人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问题,如吃饭,卫生,居住,娱乐,教育……即就是很小的问题,支部必须经过三人团迅速解决”<sup>⑬</sup>。党和工会要“解决他们一切困难”,“不放松工人每个日常斗争的领导,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领导他们积极参加苏维埃工作与革命战争,这是党在职工运动中的最重要的任务”<sup>⑭</sup>。

中央苏区时期国营工厂党组织服务功能的发挥,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政治属性的集中体现,也使广大工人群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并由此激发了他们的革命热情和生产积极性。这种热情与积极性是他们出于对中国共产党及苏维埃政权的忠诚拥护而产生的。

在中央苏区时期国营工厂党组织功能的建构过程中,支部建设构成了功能实现的前提和基础,而政治领导实际上是功能实现的目标指向,动员生产和思想教育功能则分别体现了党组织功能实现的时代特色和政党特色。在此基础上,密切联系群众则为党组织功能的有效实现提供了重要政治保障。

### 四、中央苏区时期党组织在国营工厂中功能建构的内在逻辑

中央苏区时期,国营工厂党组织在功能建构方面的丰富探索,高度契合了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属性与政党特征,是适应于革命战争和政权巩固迫切需要的产物,同时也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基层组织中建构政党权力的政治逻辑,由此也成为了此后中国共产党管理公有制工厂的重要经验参考。

#### (一)科学定位:政党功能建构的根本依据

国营工厂党组织功能的科学建构是动员和凝聚工人群众的关键环节,而对国营工厂党组织的准确定位是科学建构党组织功能的必要前提。这一时期,影响国营工厂党组织功能定位的因素主要包括其政党属性、组织定位和作用场域等,这些因素在特定时代背景下决定着国营工厂党组织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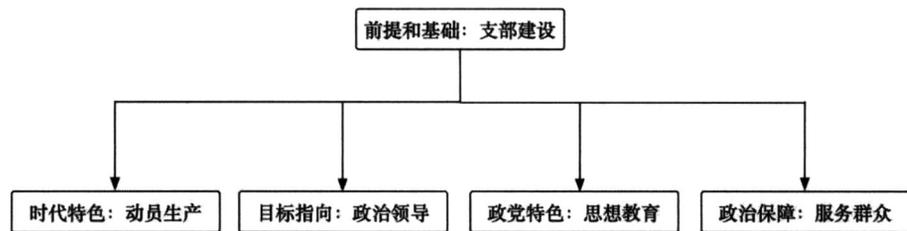


图2 中央苏区时期国营工厂党组织功能的具体实现

建构的主要内容。

一是国营工厂党组织的政党属性。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中央苏区时期的国营工厂党组织始终秉持着一心为民的政治本色。因此,为着工农兵劳苦民众的利益而斗争是该时期国营工厂党组织应然的价值追求。同时,随着中央苏区的正式形成,国营工厂党组织成为局部执政的党的基层组织。中国共产党作为苏区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毫无疑问也应是国营工厂内的领导核心。因此,国营工厂党组织的政党属性决定了其在国营工厂中领导群众与服务群众的政治任务。

二是国营工厂党组织的组织定位。基层党组织作为中国共产党同社会保持紧密互嵌关系的重要载体,由于其直接联系群众的组织特性,往往更侧重于发挥联系、组织和服务群众等政党功能。因此,也正是国营工厂党组织在党的组织体系中的“神经末梢”角色,决定其为了实现党的政治纲领、落实党的方针政策,必须在工厂中具体实施动员生产、思想教育、服务群众等工作。

三是国营工厂党组织的作用场域。作为设立在特殊场域的基层组织,国营工厂党组织的功能与国营工厂的特点紧密相关。首先,国营工厂是代表“工农兵以及一切劳苦民众”<sup>⑧</sup>利益的公有制经济体,这决定了党对国营工厂的领导地位。而该时期“工人完全地或主要地以出卖劳动力为生”<sup>⑨</sup>,因而是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重要力量。为实现强有力的阶级动员,必然要求党组织通过教育使工人“了解工人阶级全体的长远的最大的利益在哪里”<sup>⑩</sup>。同时,“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sup>⑪</sup>,从而能在改善群众生活的过程中更好地团结工人群众。因此,党组织有序嵌入了国营工厂的组织架构中,以期有效实现对工人群众的革命化动员。

总体而言,政党自身属性是中央苏区时期国营工厂党组织功能建构的根本依据。肩负着的无产阶级的崇高使命,使得国营工厂党组织必须建构起领导、动员、教育和服务等功能,从而确保能通过组织与凝聚工人群众来有效实现艰巨的生产任务,并进

而实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和时代使命。

## (二)时代需要:政党功能建构的直接动力

中国共产党根据各个具体历史时期的社会环境,对政党功能进行时代化的建构,是分析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功能时必须把握的内在逻辑。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肩负的具体的历史使命不一,因此必须适应不同时期的时代特点,才能对政党功能作出科学的建构。

首先,国营工厂党组织的建立是时代的产物。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国民党在军事上的疯狂“围剿”和在经济上的严密封锁,因此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巩固红色苏维埃政权;扩大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以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政治目标。然而,若想在动荡不安的社会大环境下,在一个民众觉悟普遍较低、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地区实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必须在密切联系群众的基础上,实现大规模的群众动员。因此,这必然要在基层广泛建立强有力的党的基层组织,提供凝聚与动员民众的坚强组织保障。

同时,中央苏区的社会环境对国营工厂党组织功能的建构提出了强烈要求。随着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和中华苏维埃政权的建立,苏区社会相对趋于稳定,探索苏维埃政权建设的时机随之到来,这也为中国共产党探索国营工厂的党组织功能建构提供了可能。在此基础上,由于仍在白色势力的包围中,为保障军民物资的供应,必须始终确保国营工厂的社会主义方向,并有效动员工人群众积极地投入生产。因此,中央苏区时期国营工厂党组织的功能顺应时代需要建构起来。具体而言,国营工厂党组织通过纪律建设、政治教育等方式,有效地维护了自身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以确保对国营工厂的坚强领导。同时,在“三人团”管理体制下,实现了政治领导、动员生产、教育工人与服务群众等时代任务。

“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sup>⑫</sup>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

对公营工厂的功能建构,实际上正是立足苏区革命实践,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生动实践。

### (三)权力建构:政党功能设置的目标指向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因为无产阶级没有坚决地执行自己的领导权,被买办豪绅阶级夺取了领导,以反革命代替了革命”<sup>⑤</sup>。自此,中国共产党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的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由此确认了党应具备领导、组织与管理社会发展的政党权力。而这一政党权力,正是通过嵌入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而实现的。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的实现,离不开规模庞大和结构严密的基层组织体系在群众中建立起的核心作用。而在公营工厂中,这一核心作用是通过工厂内党组织的治理活动建立起来的。

中央苏区时期,公营工业虽然数量有限,却是苏区经济的重要力量。为保证无产阶级牢固掌握苏维埃政权,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坚持对公营工厂的坚强领导。在领导公营工厂生产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权力主要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嵌入公营工厂:一是嵌入党的组织体系和公营工厂管理结构,在运行机制上实现党的功能;二是通过具体的领导、动员、教育和服务工作,在工厂生产经营过程中落实党的功能。可以说,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公营工厂中以组织建构和自身建设为基础和前提,延伸出了包括意志影响、生产动员、政策落实和群众关怀等在内的具有时代特色的政党功能。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权力对公营工厂的影响体现在多个方面:一是对公营工厂发展方向的领导;二是对生产动员、思想教育和服务群众等工作的目标指向的规定;三是对党员干部的有力约束。可以说,公营工厂党组织的功能建构,使工厂成为切实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载体,从而能在工厂经济价值实现的过程中实现其政治价值。

事实上,公营工厂自其诞生之日起,便因其公有制性质而具备了为革命提供物质保障与为局部政权建构提供物质基础的政治功能,这也意味着必须使党的权力贯穿于公营工厂生产经营的全过程,以更

好地建成政治影响下的公有制经济体。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对公营工厂党组织的功能建构明确了国有企业党建工作是为了保障党在企业中的坚强领导的功能性目标,这一逻辑也成为此后中国共产党管理国有工厂的重要经验来源。

### 五、结语

中央苏区时期,党的基层组织嵌入公营工厂实际上是“支部建在连上”原则在工厂场域的运用,是中国共产党在公营工厂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与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举措。同时,为革命战争和民众生活提供物质保障的时代任务,也要求党组织在公营工厂中充分发挥动员与凝聚优势,以保障工厂生产的顺利完成。因此,中央苏区时期党组织在公营工厂中的功能建构,既体现了列宁式政党对公营工厂这一重要社会单元的坚强领导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依据时代特性,对公营工厂党组织功能的侧重点做出调适,从而实现整合与动员效能最大化的生动实践。可以说,这一时期公营工厂党组织功能建构的实践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智慧。

事实上,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公营工厂党组织的功能建构已展示出较为完整的逻辑:既从组织架构上理顺了隶属关系、党企关系与党群关系,也在实际生产中确认了党组织领导与服务工厂生产、团结与动员工人群众的基本功能,这一功能建构逻辑也为此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有企业党建工作奠定了基调。在此意义上,应当将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公营经济的丰富实践,视为我国国企党建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挖掘、研究与总结中央苏区时期基层党组织在公营工厂中发挥作用的具体做法与经验,不断拓展国企党建史研究的纵深范畴。

#### 注释:

①《目前革命战争环境中的经济建设任务》,《红色中华》1933年8月16日第1版。

②《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66页。

-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3页。
-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0页。
- 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70页。
- ⑥参见钱之光:《苏区的经济工作》,载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赣州地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中央苏区风云录》,江西省修水县印刷厂1991年印刷,第178-179页。
- ⑦《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40页。
- ⑧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90页。
- ⑨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第563页。
- ⑩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29页。
- ⑪《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0页。
- ⑫《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3-134页。
- ⑬《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1页。
- ⑭邓颖超:《实际为巩固与加强无产阶级领导权而斗争的检讨》,《斗争》1933年第1期,第13页。
- ⑮《军委印刷厂工人的革命竞赛》,《红色中华》1933年12月17日第3版。
- ⑯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709页。
- ⑰《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14页。
- ⑱《苏维埃国家工厂支部工作条例(中央组织局颁布)》,《斗争》1934年第56期,第23页。
- ⑲《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页。
- ⑳《苏维埃国家工厂支部工作条例(中央组织局颁布)》,《斗争》1934年第56期,第23页。
- ㉑《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8页。
- ㉒《任弼时选集》,第71页。
- ㉓小超:《好模范!》,《斗争》1933年第10期,第16页。
- ㉔《苏维埃国家工厂支部工作条例(中央组织局颁布)》,《斗争》1934年第56期,第23页。
- ㉕汪财旺1959年3月31日的回忆,转引自许毅主编:《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38页。
- ㉖郑煌德:《在苏区兵工厂》,载陈毅、肖华等:《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10页。
- ㉗马文:《陈云同志视察中央苏区红军兵工厂》,载《中央苏区风云录》,第200页。
- ㉘马文:《陈云同志视察中央苏区红军兵工厂》,载《中央苏区风云录》,第200页。
- ㉙《关于区委对支部的领导(转载中央斗争)》,《斗争》1933年第1期,第15页。
- ㉚支国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工厂企业管理》,载严平主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行政管理的理论与实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页。
- ㉛《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84页。
- ㉜《中央审计委员会审查国家企业会计的初步结论》,《红色中华》1934年3月31日第6版。
- ㉝参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1册,第282-289页。
- ㉞《苏维埃国有工厂管理条例》,《红色中华》1934年4月14日第4版。
- ㉟刘华春:《中央苏区红军的军服生产》,载《中央苏区风云录》,第206页。
- ㊱《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09页。
- ㊲《苏维埃国家工厂支部工作条例(中央组织局颁布)》,《斗争》1934年第56期,第23页。
- ㊳《苏维埃国家工厂支部工作条例(中央组织局颁布)》,《斗争》1934年第56期,第23页。
- ㊴《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1册,第289页。
- ㊵《造币厂支部通讯》,《斗争》1933年第35期,第12页。
- ㊶狂夫:《一切为着战争为着前线上的胜利》,《苏区工人》1934年5月25日第3版。
- ㊷陈云:《关于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斗争》1933年第9期,第4页。
- ㊸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619页。
- ㊹《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774页。
- ㊺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二,第709页。
- ㊻《造币厂支部通讯》,《斗争》1933年第35期,第16页。

④转引自许毅主编:《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第539页。

④⑧《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0册,第23页。

④⑨狂夫:《一切为着战争为着前线上的胜利》,《苏区工人》1934年5月25日第3版。

⑤⑩郑家迪1959年1月2日回忆,转引自许毅主编:《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第560页。

⑤⑪《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关于中央印刷厂工作的决定》,《红色中华》1934年3月3日第3版。

⑤⑫《刘少奇选集》上,第22页。

⑤⑬郑家迪1959年1月2日回忆,转引自许毅主编:《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第543页。

⑤⑭《造币厂支部通讯》,《斗争》1933年第35期,第16页。

⑤⑮刘凯夫:《福建军区被服厂的建立与发展》,载《中央苏区风云录》,第212页。

⑤⑯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05页。

⑤⑰《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0册,第22页。

⑤⑱《刘少奇选集》上,第20页。

⑤⑲《给予战争帮助为争取革命战争全部胜利》,《苏区工人》1932年12月5日第3版。

⑥⑰《国家企业工友积极节省经费帮助战费》,《苏区工人》1932年12月20日第4版。

⑥⑱《苏维埃国家工厂支部工作条例(中央组织部颁布)》,《斗争》1934年第56期,第23页。

⑥⑲《健全支部生活的几个中心问题(续第九期)》,《斗争》1933年第13期,第7页。

⑥⑳马文:《忆中央苏区红军兵工厂》,载《中央苏区风云录》,第195页。

⑥㉑刘华春:《中央苏区红军的军服生产》,载《中央苏区风云录》,第205页。

⑥㉒《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23页。

⑥㉓郑焯德:《在苏区兵工厂》,载《回忆中央苏区》,第408页。

⑥㉔郑焯德:《在苏区兵工厂》,载《回忆中央苏区》,第408页。

⑥㉕狂夫:《一切为着战争为着前线上的胜利》,《苏区工人》1934年5月25日第3版。

⑥㉖刘凯夫:《福建军区被服厂的建立与发展》,载《中央苏区风云录》,第213页。

⑥㉗《刘少奇选集》上,第22页。

⑥㉘刘华春:《中央苏区红军的军服生产》,载《中央苏区风云录》,第206页。

⑥㉙狂夫:《弹药厂工人在生产战线上的活跃》,《红色中

华》1934年4月17日第4版。

⑦⑰《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1册,第137页。

⑦⑱孟平:《兵工厂工友不断冲锋》,《红色中华》1933年6月11日第4版。

⑦⑲《国家企业工厂互订竞赛条约》,《红色中华》1934年3月15日第4版。

⑦㉑尚昆:《转变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斗争》1933年第2期,第8页。

⑦㉒《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25-126页。

⑦㉓《苏维埃国家工厂支部工作条例(中央组织部颁布)》,《斗争》1934年第56期,第23页。

⑦㉔《造币厂支部通讯》,《斗争》1933年第35期,第16页。

⑦㉕刘凯夫:《福建军区被服厂的建立与发展》,载《中央苏区风云录》,第213页。

⑦㉖郑家迪1959年1月2日回忆,转引自许毅主编:《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第560页。

⑦㉗狂夫:《一切为着战争为着前线上的胜利》,《苏区工人》1934年5月25日第3版。

⑦㉘马文:《忆中央苏区兵工厂》,载《中央苏区风云录》,第191页。

⑦㉙《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9页。

⑦㉚马文:《忆中央苏区红军兵工厂》,载《中央苏区风云录》,第195页。

⑦㉛马文:《陈云同志视察中央苏区红军兵工厂》,载《中央苏区风云录》,第201页。

⑦㉜《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9页。

⑦㉝《苏维埃国家工厂支部工作条例(中央组织部颁布)》,《斗争》1934年第56期,第23页。

⑦㉞陈云:《关于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斗争》1933年第9期,第4页。

⑦㉟《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84页。

⑦㊱《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29页。

⑦㊲《刘少奇选集》上,第22页。

⑦㊳《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6页。

⑦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48页。

⑦㊵《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48页。

**【作者简介】**王久高,男,法学博士,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樊宸余,女,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原文出处】**《山东社会科学》(济南),2023.7.5~15